

崔瑛焕《性灵集》考

(韩)琴知雅

清代康熙后期和乾隆年间,诗歌领域兴起了以强调自然真情、追求个性解放、宣扬主体意识为主要精神的性灵诗说。

在朝鲜,“性灵”这一用语散见于诸多资料当中。但作为诗歌创作的核心概念,“性灵”正式出现在批评史上大概在17世纪以后,当时金昌协、汉诗四家(后四家)^①等吸取明代公安派和清代袁枚的性灵说,展开了“性灵争论”。

19世纪是朝鲜实学思想集大成的时期,文学领域的多种变化促使文学的担当阶层有所扩大。17、18世纪时委巷文人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天机论”再次成为委巷人开展各种文学活动的理论依据,他们这些人层的文学的主体自觉也开始被论及。

这一时期,“性灵”主要出现在金正喜(1786-1856)和一群中人出身的文人的文献当中,如崔瑛焕(1813-1891)、郑芝润(1808-1858)、张之琬(1806-1858)等。与崔瑛焕有至交之情的张之琬曾说:“诗出性情,世无性情之人。”^②崔瑛焕也曾编纂了庞大的诗选集《性灵集》,并强调“今体诗得性灵之为最近”,“专主性灵而后格调捨气魄”。郑芝润也曾指出“最玲珑处性灵存,不下深功不易言”^③。这些主张均以金正喜的“各从其性灵以所近,不可得以拘泥于一端”^④中所提及的性灵为依据。虽然它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但从整体来看,“性灵”已发展成为用来阐释诗歌创作特点的核心概念之一。

①可考证,当时也不过只是由和袁枚约相差一代的汉诗四家介绍了一部分性灵派诗人的部分作品。汉诗四家利用几次燕行的机会和当时被称为性灵派的诗人们直接交往,并将他们的作品收录到了自己的诗话集和诗选集中。但遗憾的是,他们所收录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迎合自己诗话集或诗选集收录原则的作品,而不是体现清代性灵派性灵论的作品。对于生活在18世纪的他们来说,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接受性灵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汉诗四家之后,也仍然很难找到专门研究性灵诗论及性灵派诗人的资料。参申载焕:《朝鲜后期清代性灵派作者介绍小考》,《中国语文学》,2002年。

②张之琬:《枕雨堂集·书自庵和陶邵集》,间巷文学丛书3。

③郑芝润:《夏园诗钞·作诗有感》,间巷文学丛书5。

④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杂识》卷8。

但是此前的大部分文章都将之统称为委巷文人而进行总体研究,很少对其中某个人的文学观点进行分析。为此,笔者特别关注了崔瑗焕及其编写的《性灵集》,发现崔瑗焕在编写庞大的中国诗选集《性灵集》时,主要以自然真情、自然而真实的心灵为评价诗歌的重要尺度。本文将通过分析此诗集来探讨崔瑗焕所主张的性灵论的核心内容,同时也将力图阐明清朝的性灵论是怎样为19世纪朝鲜文坛所接受、吸纳乃至评价。

一、崔瑗焕其人

崔瑗焕(1813-1891),忠州人,字星玉,号于是斋。中人出身^①。纵览《忠州崔氏大同谱》和《蕊城崔氏世继》,以及译科、云科、律科等杂科榜目等^②资料,发现崔瑗焕的兄弟及其近亲中有很多人都是杂科及第者。崔瑗焕家中及第杂科的人共有15人,其中2人及第译科,4人及第律科,9人及第云科。这些人都是崔瑗焕祖父润祥的子孙,也就是崔瑗焕的堂兄堂弟们。

不少人更愿意称崔瑗焕为武人,而很少言及他的中人身份,如哲宗时的南秉哲(1817-1863)在为崔瑗焕编纂的《视民要诀》所写的跋文中介绍崔瑗焕为“武人崔君瑗焕”,李圭景(1788-?)在《五洲衍文长笺散稿》里的《士小节分编刻本辨证说》中也称崔瑗焕为“武人”。而且事实上,崔瑗焕不仅曾及第武科,而且所任多个官职也全为武官。因此,笔者认为将崔瑗焕称为中人出身的武人当更为妥当。

一般史书里都记载崔瑗焕的官职为“都事”。此外1859年(哲宗10年)进行的“增广生员进士试办”的榜目中也有所记载。崔瑗焕之子崔圭辑通过了这一年的生员试办,其榜目中记载其父崔瑗焕的官职为“前宣略将军行中枢府都事”。所有这些指的都是崔瑗焕的最终官职。

关于崔瑗焕何时辞官,可以通过两个文献得以了解。崔瑗焕《顾问备略》的序文^③中有张之琬的“近致官东归,耕于嘉陵山下”一句话。另外,崔瑗焕编纂的《性灵集》的自序中有更为具体的记录:集始于东归甲寅(哲宗5年,1854)之岁,迄戊午(哲宗9年,1858)而成。由此可知,崔瑗焕辞官之时为1854年,为官前后12年。但就在这短短的为官生涯中,他结交了很多朋友,并撰写了诸多书籍。崔瑗焕辞官后更专注于著书写作。主要有教化书《觉世新编八鉴常目》(11卷6册,1856年编刊),奉宪宗之命编写、以阐明当时体制的问题并提出改良方法为主要内容的《顾问备略》(4卷2册,1858年著,亲笔手稿本),汉城府及八

①李佑成:《金秋史及中人层的性灵论》,《韩国汉文学研究》5辑,1980。

②白贤淑:《崔瑗焕其人及其著作》(《历史学报》103辑,1984)里对根据这些资料所勾画的世系图有详细介绍。

③崔瑗焕:《顾问备略》,国立中央图书馆笔写本(手稿本),合缀东京大学图书馆笔写本;西江大学校人文科学研究所影印,1984年。

道的地理书《輿图备志》(20卷20册,编纂年不详),劝善书《太上感应篇图说》(5卷5册,1880年刊行),为《孝经》加注的《孝经大义》(卷册不详,1882年著)等等。由此可见崔瑗确实是一位具有相当水平的学者。

崔瑗所结交的朋友首推张之琬和郑芝润。张之琬(1806-1858),中人出身,1825年(纯祖25年)及第律科,是朝鲜后期代表性的委巷诗人。他以自己的号为名组建了“斐然诗社”,引导了中人层的文学活动。张之琬曾为崔瑗的著述《顾问备略》书写过序文,而崔瑗也曾为张之琬的诗集《斐然箱抄》撰写过序文,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友情甚为密切。郑芝润(1808-1858),中人出身,及第译科,当时的著名诗人,参加过张之琬的斐然诗社。崔瑗刊行其诗集《夏园诗钞》时曾在诗集的题辞中表示:虽于晚年之时才与郑芝润相遇,但友情却更为深切。崔瑗与当时的两位著名诗人保持着深厚的友谊,这说明他也有文人的一面。但事实上他从未参加过张之琬的斐然诗社,也没有任何记载表明他曾写过诗。虽然他留下了很多著作,但却没有留下任何一首诗。尽管如此,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就是他很关注诗歌,并具有很高的鉴赏水平。

这一点可以从他1858年所编纂的《性灵集》中看出,《性灵集》是他根据性灵派的主张从中国历代诗歌中进行筛选编辑而成的诗选集。因而,与其说他是诗人,还不如称他为诗歌评论家或者诗论家要更为妥当。除《性灵集》以外,他还编纂了收录挚友郑芝润诗集的《夏园诗钞》(1册)和《东国雅集》(1册)。崔瑗可能是在编纂完收录中国诗歌的《性灵集》之后又想到了要以同样的方法来整理、收录朝鲜诗歌。《东国雅集》编纂年代不详,共收录有40余篇朝鲜诗歌。体系不够清晰、明确,可能是诗集成书之前的草稿。

二、关于《性灵集》

1. 版本现况

笔者通过《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①、韩国古典籍综合目录系统(<http://www.nl.go.kr/korcis>)、韩国历史情历统合系统(<http://koreanhistory.or.kr/>)、《韩国古书综合目录》(韩国国会图书馆编)等,可以知道现存崔瑗《性灵集》主要有木活字本和笔写本两种版本。

^①笔者参与编纂的《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6册(全寅初主编,学古房刊,2005)收录了从近30种古书目录中挑选出的与中国相关的12,500余种汉籍。“与中国相关的汉籍”是指流传至韩国的中国版本、在韩国刻印的中国典籍以及由韩国人添加注解的中国典籍加注本。韩国所收藏的大量与中国相关的汉籍中既有从中国流传来的版本,也有在韩国刻印的中国典籍,此外还有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等其他国家刊行的版本。当然其中也包含有大量的笔写本和韩国人编纂的收录中国人作品的书籍(韩国本中国诗选集)。虽然这些书籍的编者都是朝鲜人,且又是在朝鲜刻印的,但通过这些书籍可以了解到中国诗选集的传入和刊行情况,而且所收录的内容又都是“中国历代诗歌”,所以也就将这些书籍也都收录到了本书当中。

木活字本主要收藏在国立中央图书馆、奎章阁、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涧松文库、岭南大学、启明大学。委巷诗人张混(1759-1828)的重大贡献就是制作木活字将众多委巷诗人的诗集编辑刊行。这些木活字的宽高分别在12mm及8mm左右,是比较宽平的活字。其字体为笔书体,比其他官铸活字要显得小而且精美。根据朴徹庠的论文^①,该活字最初是由李明艺所写,为金载明所藏。可能之后又由张混收藏并用于出版。张混过世后,大约在1857年左右,崔理焕收藏了这些木活字,并利用它们编辑刊行了委巷诗人们的诗集以及道教方面的书籍。崔理焕收藏这些木活字的具体年代无从可考。只能从1857年春刊行的张之琬文集《斐然箱抄》中收录的崔理焕的序文中了解到,崔理焕是在收藏了这些木活字后才刊行这本文集的。第二年1858年编纂的《性灵集》也是用这些木活字印刷的。

笔写本主要有翠菴文库本(完帙)、雅丹文库本(宋、金、元诗1册)以及笔者个人所藏本(摘句1册)。此外还有以《历代名媛诗》、《摘句诗》等为名的藏本。

从上述藏本的卷数来看,既有完帙本(20册;国立中央图书馆、延世大学、奎章阁、高丽大学、岭南大学、翠菴文库),也有零本(启明大学11册、涧松文库11册、雅丹文库1册、笔者所藏1册)。

20册完帙本的卷次基本一致,只有延世大学本略有不同。国立中央图书馆等藏本的第15-17册为续集,18-19册为补遗。而延世大学藏本却是第15-16册为补遗,第17-19册为续集。

2. 编纂体系和特点

《性灵集》是崔理焕辞官后从42岁起开始编纂,历经4年于其46岁(1858年,哲宗9年)^②时刊行的中国历代诗选集,共有39卷20册,1,216张。其子崔圭辑负责了该诗选集的校正工作。

《性灵集》收录了汉魏至清1200多年的诗歌,数量庞大,但其体系却不失井然。本集5集以时代为序,第1集含第1-2册,分3卷收录了汉魏南北朝的诗歌;第2集含第3-5册,分6卷收录了唐五代时期的诗歌;第3集含第6-8册,分6卷收录了宋、金、元时期的诗歌;第4集含第9-11册,分6卷收录了明代的诗歌;第5集含第12-14册,分6卷收录清代的诗歌。各集卷首均有目录,且均按照五古、七古、五律(附:五言排律)、七律、五绝(附:六言绝句)、七绝等诗体分类。续遗中收录的是女流诗人的“名媛诗”,共6卷,也按照诗体分类。补集为4卷,收录的是历代诗句,分为五言摘句上下、七言摘句上下。续集补遗

①尹炳泰:《朝鲜后期的活字和书》,凡友社,1992年,第339页。

②序言结尾处的“集始于东归甲寅之岁,迄今戊午而成集”这句话是唯一表明该诗集年代的记录。崔理焕是高宗时期的著名诗人,以此可以判断这里所说的戊午年可能指的是1858年(也有人认为是1918年)。

收录的是历代名媛摘句诗,共2卷,也分为五言摘句和七言摘句,且每个摘句下面都有对该诗句的题目和作者的介绍。

此诗选集的凡例中所体现的编纂体系和特点如下。

第一,诗选集囊括了汉魏至清几乎所有时代的作品。编者崔理焕尽量均等地收录了长达1200多年的各年代的诗歌,但还是相对多地收录了一些自己所处时代的诗歌。另外,诗选集中没有收录先秦以前的古逸诗,只收录了五言、七言,编者称长短句、三言、四言为古逸而没有将其收录。将先秦以前的诗歌排除在外,这意味着编者是想继承中国最高水平的诗歌选集《诗经》,将其以后时代的作品收录编辑成册。这也可以说是自《诗经》以后第一次将各个时期的作品予以概括整理。

像这样的尝试,清代的袁枚也曾为之。他说:

选诗如用人才,用才须宽,采取须严。能知派别之所由,则自然宽矣。

能知精采之所在,则自然严矣。余论诗似宽实严。^①

袁枚将选诗比喻为录用人才。录用人才可有两种方法,一是注重派系和门户,一是不注重派系和门户而均等录用。袁枚赞同后一种方法。袁枚时代很流行根据各门户派别编写有体系的精华录的选诗方式。这种方法不是像《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古诗源》、《唐诗别裁》等那样按照时代和渊源来选录诗歌,而是为体现性灵说的基本理念而“博取”包括无名士在内的所有人的诗歌。这种方式所选录的诗歌大部分都是袁枚时代即清中期的诗歌,也包括《诗经》、汉乐府、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以及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和明前后七子等的诗歌。只要是有助于阐明自己诗学理论的作品,不分年代,均选以录之。

第二,诗选集以时代为序将诗歌分别收录在1至5集中。如汉魏南北朝时代的作品收录在1集,唐五代的作品在2集,宋金元时代的作品在3集,明代的作品在4集,清代的作品在5集。5集以外还另有收录历代名媛诗歌作品的续集补遗,但不以时代王朝为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摘句诗^②本是清代袁枚《随园诗话》所采用的方式。袁枚在诗话内选录5千余首诗歌,一方面是想阐明自己的性灵诗论,另一方面则是希望此诗话也可作为一本诗选集。诗话中共有2003个条目,而其中的1820

①袁枚:《随园诗话》,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8页。

②其实,“摘句”一词源自王士禛《池北偶谈》卷13。王士禛(1634-1711)很喜欢施闰章(1618-1683)的诗,所以摘录了82句五言律诗,由此便有了“摘句”一词。受王士禛影响的李德懋(1741-1793)也在他的《清脾录》中大量收录了同时期诗人的联句或摘句。金正喜(1786-1856)也受到这种影响,从翁方纲(1733-1818)诗歌中摘句编纂了《覃诗摘句》。由此可见,崔理焕之前在朝鲜已有了摘句的传统。(金荣镇:《Berkerey大学 Asami 文库所藏“五家诗摘句”》,《古典与解释》创刊号(2006),再引。)

个条目收录的全部都是诗歌。一般每个条目里收录有两至三首诗歌或佳句,且多是无名人士的作品。下面这段文章体现了袁枚对全诗和摘句的看法:

诗有有篇无句者,通首清老,一气浑成,恰无佳句令人传诵。有有句无篇者,一首之中,非无可传之句,而通体不称,难入作家之选。二者一欠天分,一欠工夫。必也有篇有句,方称名手。^①

袁枚认为,全诗虽好,却无佳句,是为天赋不足;而全诗不好,却有佳句,是为后天努力不足,只有全诗也好又有佳句的诗歌才可列入名家之列。因此,收录于诗话中的诗既有全诗,也有对偶句形式的佳句。

第三,诗选集收录的近体诗多于古诗,这是因为编者崔理焕认为近体诗更有利于发挥性灵。另外,编者还更多地收录了近于自己所在时代的诗歌,这是因为他认为越是离自己近的时代诗歌越和自己的性灵相近。编者崔理焕的这种观点与将传统的盛唐诗作为典范的复古主义儒学者们的观点成鲜明对比,他只以性灵为评价诗歌的标准。每集均按照古诗、律诗、绝句的顺序排列,排律和六言绝句则附在其后。另外,越是距己甚远时代的作品处理得越简略,而越是离己甚近时代的作品介绍得越为详细。依据这种选录原则,时代越后的,以一个王朝的作品独自成集的居多;时代越前的,则以多个王朝的作品拼合成一集的为多。

第四,《性灵集》的编纂体系中最为独特的一点就是编者故意为后人留有了余地,以便于他们可以按照《性灵集》的体系继续不断地进行补充:

是集成于五集及续集及补遗及续集补遗而止。后之编诗者,欲嗣是而续成,则当编以六集七集,以至无穷可也。续集之续成者,则当曰再续集三续集,以至无穷亦可也。补遗之续成者,则当曰再补遗三补遗,以至无穷亦可也。续集补遗之续成者,则当曰再续集补遗,三续集补遗,以至无穷亦可也。此是集之所以分作一二三四五集,及续集及补遗及续集补遗也。^②

第五,诗选集中只介绍了所收录诗歌的作者的姓名、时代以及理解诗歌作品时所必需的内容,而没有介绍作者的字或官职等。另外,编者崔理焕只以是否符合自己的选录标准选诗,而不关注诗人的知名度或身份等。

三、崔理焕的性灵论——“有我”

崔理焕的《性灵集》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资料,因为通过它可以阐明19世纪朝鲜以委巷诗人为核心所展开的性灵论究竟视何种作品为典范这一问题。可以说,像《性灵集》这样明确标榜不重视外在因素而只关注内在精神层面并以周密有序的体系编辑而成的诗集是较为少见的。

《性灵集序》可谓是集中体现了崔理焕的文学论,其所论及的最核心问题

^①《随园诗话》第119页。

^②崔理焕:《性灵集·凡例》,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

就是古与今的问题。该如何批判地继承先前时代的文学遗产,该如何进行整理并使之与当时的创作相接轨、融合,便是《性灵集》编纂时编者所抱有的主要问题意识。

从崔瑗的《东国雅集》可以看出,崔瑗并不是只在单纯地整理中国诗歌作品,而是想在整理完自中世以来就一直和韩国的诗歌创作活动保持着紧密关联的中国诗歌之后,即对韩国方面的情况予以整理。18世纪后期已经在朝鲜广泛形成了对主张“诗必盛唐”和“文必秦汉”的复古主义进行批判的潮流。所以文坛也广泛主张要摆脱先前时代的价值观和典范,树立新的价值观和典范。而崔瑗也继承了这种创新主义。下面来具体看一下集中体现了崔瑗性灵论的《性灵集序》。

人亦有言,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书,已书古人手者也。我何敢开口而着手哉?然而惟是一派性情,则人所以有各自具者,我何尝与古人异哉?对景而写,感物而兴,亦有所不能自己者。然无奈已经古人之口与手矣。腐心呕血,自以为工矣,谁知已蹈古人之习气?穷虑秘搜,自以为新矣,谁知已被古人之道破?顾何必穷尔虑腐尔心自苦之为哉?^①

“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书,已书古人手者也”,该句出自袁枚《随园诗话》所引丁珠的诗句。意思是说,我想要说的和写的都已是古人所说过和写过的,所以这很难表现我自己的主体精神和个性。

灯夕花朝,披阅古人卷,有写景者,有言情者,有正直者,有婉媚者,有俊秀者,有博大者,有玄远者,有真率者,有鬼怪者,有雕刻者,有奥峭者,有崛强者,有俳谐者,有富艳者,有芬芳悱恻者,有瑰玮璀璨者,以至司空表圣所谓二十四品者,万象毕陈,眩我之心目。然未必皆合于我之性情矣。其或遇我之性相近者,则自然舞蹈之,既而感叹之,继而恨不为我之有,中心魂垒者,亦屡日矣。^②

先前时代所留下的文学遗产非常丰富,而且形式也多种多样。从描写景物的作品到怪异、璀璨的作品,再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先前时代留下了非常丰富的、风格多样的文学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并非都符合审美主体的性情,并非都足以引起审美感兴。也就是说,虽然前代留下了数不胜数的作品,足以让人们头眩目晕,但真正符合审美主体性情的作品却为数不多。这时所需要的就是进行主体转移,即以生活在现今时代的我的观点来重新评价、鉴赏先前时代的作品。以此观点为基础,崔瑗又进一步提出了“古人之性(情)即我之性(情)”的主张:

古人之性,即我之性,古人性之所好,即我性之所好。以古人之性道古人之所好,直不过如是也;以我之性道我之所好,亦直不过如是也。是古人之所言者,即我之言也。岂可以不经我口,遂谓之非我之心哉?然则我心之

①②崔瑗:《性灵集·序》,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

所合者，固我之言也；我心之所不合者，非我之言也。取其所合之言，而以为我言，则其言之发为文章者，即亦我之文章也。其谁曰不然？此我性灵集之所以撰也。^①

符合我心的话才是我的话，当它被表述成文章时，这篇文章也就是我的文章。鉴赏、评价作品时关键不在于是否进行了作品创作，而在于是否能找到符合我性（情）的作品——不管这作品是自己直接创作的还是别人创作的。只要符合我的性（情），即使是别人的诗文、古人的作品，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整理编辑中国历代诗歌也并不单纯只为整理、介绍前代的作品，而是因为这些作品符合我的性（情）。

崔理焕将《性灵集》的本质概括为“然则是诗也，虽曰百代之诗，而是集也，宜为我一人之集也”。他这种看法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批评观。根据他的这种观点，他所编纂的《性灵集》就是根据他自己的“性（情）”重新创作的自己的“文章”，是他自己的“文集”。这种再创作过程同样也可以出现在后之编诗者的身上，所以如前面所提到的，崔理焕也就是根据这一点采用了以时代王朝为序的编纂体系。

这一点在另一部中国历代诗选集张混的《诗宗》（1810年左右刊行）^②中也有反映：

诗之言志也，凡触于物，而感于心，而发为诗，而所称豪壮也，沉郁也，闲澹也，峭奇也，秾丽也，纤致也。千变万殊，横说竖说，夫莫非臻其妙者，犹松柏草花之各得其天，不可偏废。^③

张混认为诗出于“天机”，因此要尊重每个诗人的个性表达——“诗是天机出，繁芜且莫删”^④。张混和崔理焕均属中人层，他们所编纂的诗选集所收录的也都是中国历代诗歌作品，所以笔者认为崔理焕的《性灵集》继承发展了张混《诗宗》天机论的诗意识。

作者工作单位：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

①崔理焕：《性灵集·序》。

②张混（1759—1828）的《诗宗》是他历经20多年编纂的一部庞大的中国诗选集，共24卷13册。该诗选集以时代、诗歌形式为序收录了自上古时代至明代共1130余名诗人的作品。

③张混：《诗宗·诗宗仪礼》闰集，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

④张混：《而已广集》卷6《秋怀杂咏寄衍夫》第15首。